

# 《石渠寶笈三編》 的鈐押 相關印記

王崇齊

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，清仁宗下令整理宮內收藏的書畫，並參照他父親乾隆皇帝的前例，將這些書畫著錄編成了《石渠寶笈三編》。當時負責此事的人員，大概會覺得時光又重回二十多年前編錄《石渠寶笈續編》的景況——忙著評定可以選入「石渠寶笈」的作品，忙著依照一定的規矩，為這些作品蓋上適當的印記。然而，就算已經訂出處理、挑選作品的規矩，但實際狀況往往不能盡如人意。所以，收入《石渠寶笈三編》的作品，其上印記組合，便在「大同」之中存在著「小異」。這些小小的差異，其實就是當時工作人員面對現實狀況的反應與調整。

## 緒論

清代乾隆嘉慶兩朝，曾三度對宮廷中所藏的書畫加以整理，接著，根據一定的規則，在這些書畫作品上鈐押相關印記，並登錄編纂成書。首次的整理、審定，編成了《石渠寶笈初

編》一書，第二次與第三次則分別編成了《石渠寶笈續編》、《石渠寶笈三編》（以下分別以《初編》、《續編》、《三編》簡稱）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書畫收藏品中，有很大一部份都歷經了這三次的收藏整理編活動，所

以在展場欣賞作品時，也很容易看見相關的印記。有的印記，一見便能聯想其鈐用規則：如「寶笈重編」（圖一）印記，應該是纂輯《續編》時所鈐用；而「寶笈三編」（圖二），望文生義即可直指第三次的整理活動。



圖一 武元直《赤壁圖》上的「寶笈重編」、「石渠定鑑」鈐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董其昌《千字文》上的「寶笈三編」鈐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若是想瞭解更多的鈐用規則，可以參考這些著錄書籍的凡例，以及清代阮元的《石渠隨筆》一書。二〇〇六年，郭果六曾發表〈窗外讀印雜記〉一文，文中他基於對書畫實物的仔細觀察，將文獻所載的鈐用規則一一對合，並加以清楚說明，確實可幫助我們更快速、更深刻掌握這些規則。

有趣的是，某些實物上的特別狀況，固然未見文獻記載，卻似乎承載了當時的相關訊息，有待我們去推敲。如二〇〇七年時，李郁周發表〈乾嘉二帝的兩套書畫收藏印——石渠寶笈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宜子孫〉一文，指出鈐押於書畫上的「石渠寶笈」、「宜子孫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三印，應有兩套，兩套印文大同而小異，且其中一套鈐於編入《初編》、《續編》的作品之上，另一套則往往鈐於編入《三編》的作品中。由於《初編》、《續編》成於乾隆朝，而《三編》的纂輯已在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，所以，李郁周在文中推定：這兩套印記分別屬

於清高宗、清仁宗專用。這一發現雖無有力的文獻佐證，卻一定程度地反映、說明了實物的狀況，讓我們能透過實物看見文獻未及之處，瞭解嘉慶皇帝所敕命編纂的《三編》，雖是依照清高宗《初編》、《續編》成例，但他也在既定的規矩前例之下，選用了與他父皇清高宗「大同」而「小異」的印記，低調標誌屬於他個人的獨立性。不過，李郁周也指出院藏宋代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（圖九，典藏號：故書七〇）雖收入《三編》之中，其上「石渠寶笈」、「宜子孫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三方印記卻屬於乾隆皇帝的套印，就中原委還未釐清。則數百年前纂輯《三編》之際，或許還有些規則底下的狀況需要發掘、不見於文字載錄的聲音有待傾聽。因此，以下便在郭果六、李郁周二人的研究基礎之上，從一些著錄於《三編》的院藏書畫，觀察其上相關鈐記組合、使用的狀況，推測當時脈絡，或許能稍稍重現當年纂輯《三編》相關人員所面對的狀況，以及他們採取的應對措施。



圖五 馮寧〈撫序延清〉(局部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董其昌〈千字文〉與馮寧〈撫序延清〉上的「嘉慶鑑賞」鈐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晨起閱章  
奏曉庭夏  
氣和萬幾  
慮叢勝一  
字慎差訛  
靜養寸田  
澹徐籌庶  
事多敬勤  
遵  
考訓畧刻  
肯徒過

「石渠寶笈」筆劃較粗而布局緊，「三希堂精鑑璽」之「希」字「巾」部較長，「宜子孫」之「子」字左右兩豎較為垂直，皆合於李郁周所指出

的特徵(圖四)。這種鈐有典型印記組合且收入《三編》的書畫作品，在院藏或是其他公私收藏中較為常見，可以說是最典型的「《三編》書

畫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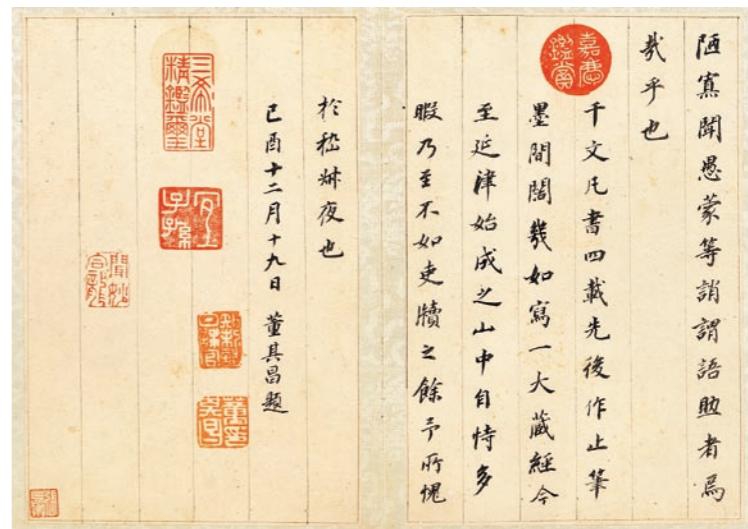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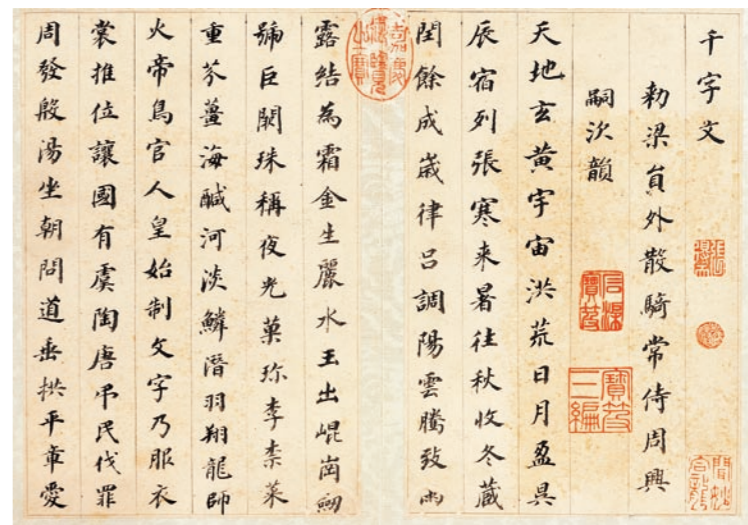
接著，我們可以觀察另一件收入《三編》作品：清代馮寧〈撫序延清〉(圖五，典藏號：故畫三三九九)，其上亦見嘉慶朝編入《三編》所鈐押的標準印記。不過，取董其昌書〈千字文〉與清代馮寧〈撫序延清〉兩件作品並觀，很容易發現作品上的「嘉慶鑑賞」印記並不相同，一是圓形白文印，另一件為長方形朱文印(圖六)，雖其印

### 典型石渠寶笈三編的鑑藏寶璽

在此先借用前述李郁周對印記的分類，亦即他認為乾嘉二帝各自擁有一套「石渠寶笈」、「宜子孫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印記，所以，本文行文之際，便分別在印記前冠上「乾隆型」、「嘉慶型」區別之。若結合〈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凡例〉所

言：

古今臣工書畫，則用「嘉慶御覽之寶」、「嘉慶鑑賞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、「宜子孫」，或曰：「秘殿珠林」、或曰：「石渠寶笈」凡五璽，又加「珠林三編」、或曰：「寶笈三編」一璽，以示別於《續編》。



圖三 董其昌〈千字文〉及其上印記(局部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董其昌〈千字文〉上的「石渠寶笈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、「宜子孫」鈐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則我們可以很清楚掌握，典型收入《三編》的書畫，其上應有「嘉慶御覽之寶」、「嘉慶鑑賞」、「石渠寶笈」、嘉慶型「宜子孫」、嘉慶型「三希堂精鑑璽」五方印記，如院藏董其昌書〈千字文〉(圖三，典藏號：故書二〇六)上，便可以看到《三編》印記的典型組合。其中



圖八 任仁發〈飲中八仙圖〉(局部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乾隆鑑賞」圓白文印紅色部分多而顯眼，而同在戴嵩〈畫牛〉(圖七)上所鈐的「嘉慶鑑賞」白文圓印，不但形式與之相似，又同樣帶有鮮豔顯眼的紅色區塊，所以，在視覺效果上便略微互斥。相對而言，在任仁發〈飲中八仙圖〉(圖八)上，其「乾隆鑑賞」、「嘉慶鑑賞」印記一圓一方，一白文一朱文，視覺上便顯得互補而協調。或許正因為如此，原以「嘉慶鑑賞」白文圓印為《三編》標準印記的定則，才因於同式「乾隆鑑賞」印記的鈐用，就現實狀況加以調整。且以筆者所見的作品看來，絕大部分典型「《三編》書畫」，都鈐以圓白文「嘉慶鑑賞」，若作品上原本已鈐有圓白文「乾隆鑑賞」，則多半以長方形朱文「嘉慶鑑賞」鈐押，其以「乾隆鑑賞」、「嘉慶鑑賞」兩方圓白文印相配使用的畫作甚少。目前雖無具體文獻說明兩式「嘉慶鑑賞」的使用分別，這種數量分佈的趨向，或許也指向筆者前述的推測：長方形朱文「嘉慶鑑賞」的使用，確實與圓白文「乾隆鑑賞」的鈐用與否，有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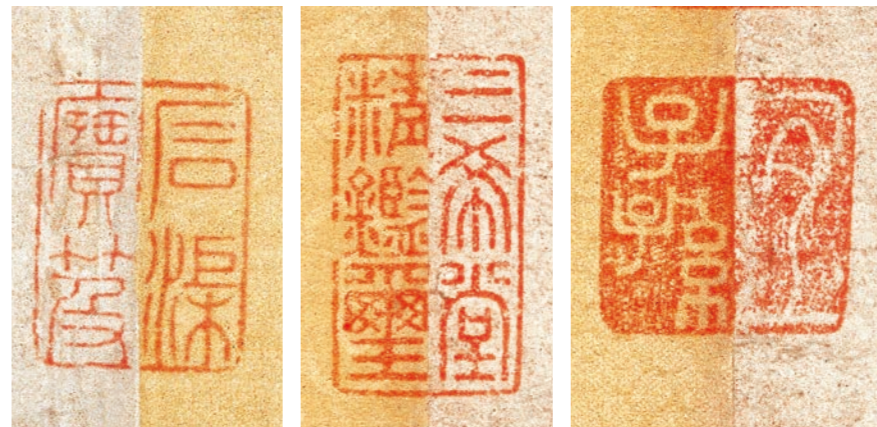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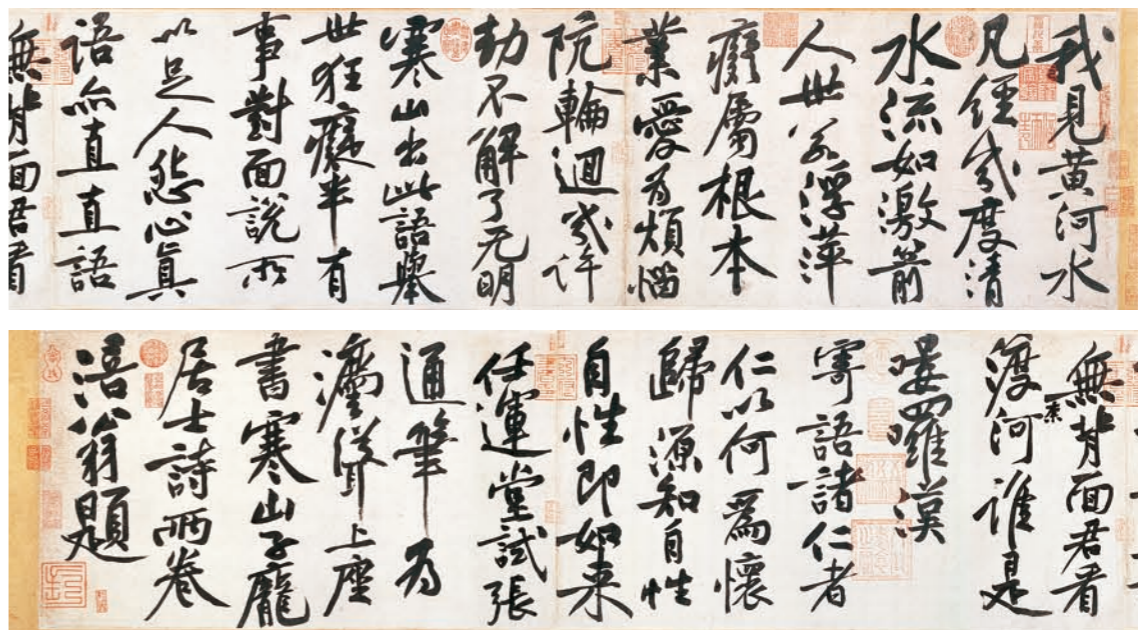
文相同，可說合於〈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凡例〉所述，但也令人感到一絲絲疑惑。今取院藏戴嵩〈畫牛〉(圖七)，典藏號：故畫一七七二)、

傳任仁發〈飲中八仙圖〉(圖八，典藏號：故畫一五二〇)兩件作品略加比對，便會發現兩幅作品之上，都有圓白文「乾隆鑑賞」鈐記，但是「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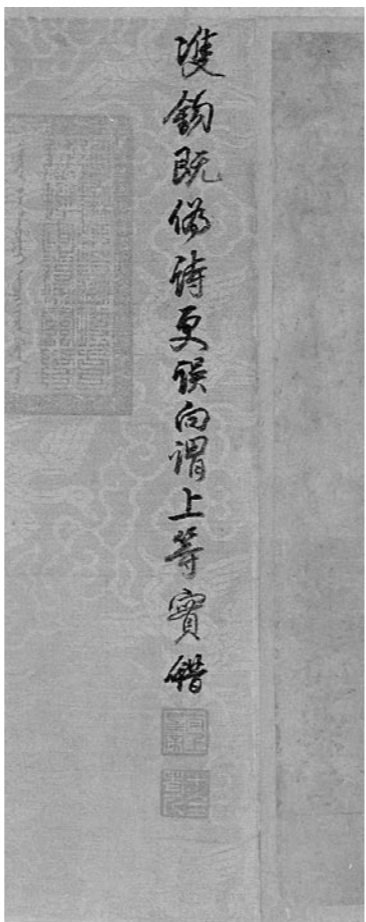
慶鑑賞」印記則一為長方形朱文印，一為圓形白文印。其中緣由，雖未見於文獻記載，卻可由畫面的視覺效果切入，嘗試推敲當時的狀況。由於



圖七 戴嵩〈畫牛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及其上鈐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（局部）



圖十 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卷前清高宗題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詩》很可能原在《續編》收入之列，因為這層轉折，才被排除於《續編》之外。根據〈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凡例十二則〉所載：

內府書畫，初入選者，鈐用重五，曰：「乾隆御覽之寶」，曰：「乾隆鑑賞」，曰：「三希堂精鑑璽」，曰：「宜子孫」，或曰：「石渠寶笈」，或曰：「秘殿珠林」。今擇其尤精入書者，各加鈐重二，或曰：「秘殿新編」、曰：「珠林重定」，或曰：「石渠定鑑」、曰：「寶笈重編」。

可知初入選《續編》的書畫，雖已鈐有多方內府藏收印記，但要確

正向的關係，而如戴嵩〈畫牛〉上的圓白文「嘉慶鑑賞」、「乾隆鑑賞」鈐印組合，可視為未轉變使用方式前的少數例子。至於馮寧〈撫序延清〉（圖五）的鈐記，可能是在兩式「嘉

慶鑑賞」印相對之下，選取了較適於畫幅調性的印記所致吧。綜上所述，前引〈凡例〉中言及的「嘉慶鑑賞」印記，其實包含了兩式印文相同的印份子，而文獻未載的考量與斟酌，也在這些小細節上重新被發現。

### 拾取遺珠：石渠寶笈三編印記的別樣組合

除了典型的《三編》印記組合外，略事注意《三編》著錄的作品，很快就會意識到另外兩種印記組合。其一，即李郁周所指出的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（圖九），其上「石渠寶笈」、「宜子孫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皆為乾隆型印記，乍看之下，確實讓人困惑，但前隔水有乾隆皇帝所題：「雙鈎既偽詩更誤，向謂上等，實錯。」（圖十），或許給我們一些線索。根據此一題記，可知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曾被乾隆皇帝視為上等之作，只是他後來才改變心意，認為這是一卷雙鈎的黃庭堅作品。因此，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

定編次選入《續編》，才會加鈐「石渠定鑑」、「寶笈重編」二印。而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一作，上有初入選《續編》的五方乾隆型印記，並未見有「石渠定鑑」、「寶笈重編」二印，應是《續編》汰去的遺珠，而在嘉慶皇帝在纂輯《三編》之際拾而取之，並加鈐「寶笈三編」、「嘉慶鑑賞」二印，才成為今日所見的面貌。有趣的是，帶有這種印記組合的《三編》書畫作品，其上往往可見乾隆皇帝的題記吟詠，如院藏唐寅〈採蓮圖〉、丁觀鵬〈摹顧愷之洛神圖〉、沈周〈溪橋訪友〉等皆是。這或許是確定《三編》選入作品時，除了品質的好壞之外，其上是否有著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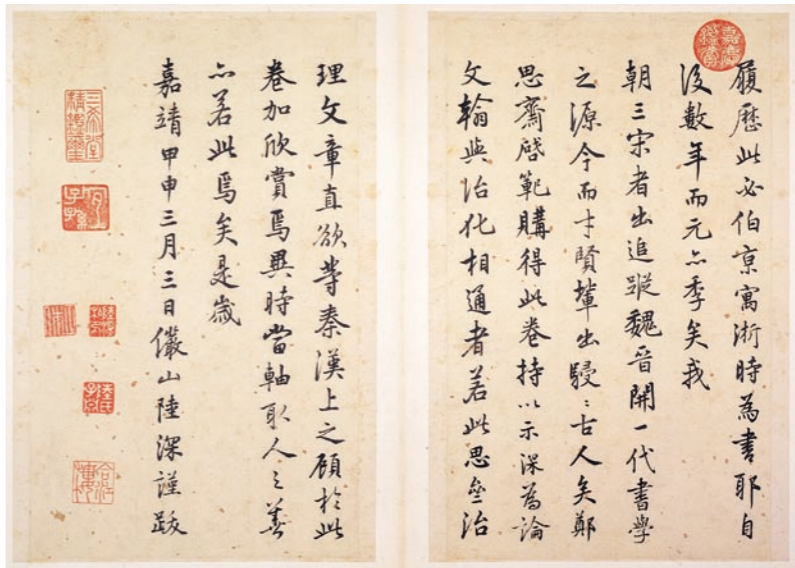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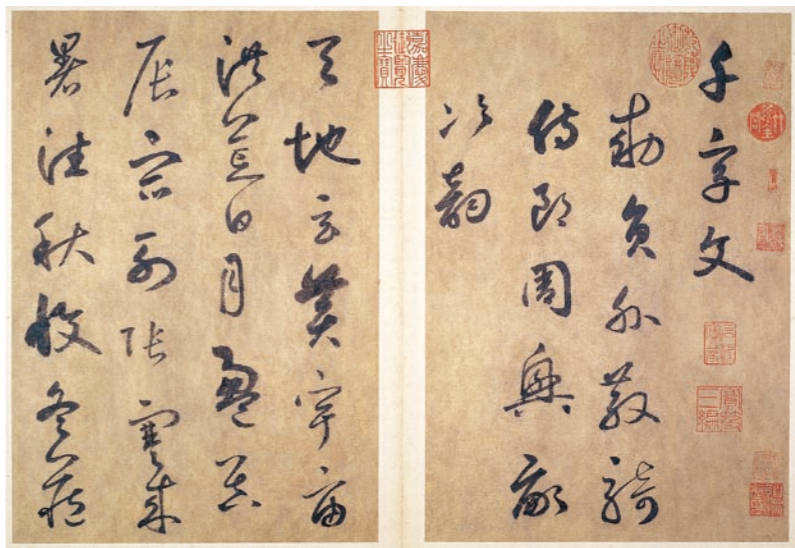
隆皇帝的題記，很可能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，成為作品能否重入「石渠」的契機。此外，院藏王誨〈瀛山圖〉、唐寅〈山居圖〉雖已收入《初編》，卻因其是「後經高宗純皇帝重加題證，暨皇上幾暇留題者」（《三編》凡例）而同時有著乾嘉二帝題記，故又被收入《三編》中。這顯示清高宗的題記，確實在《三編》的編次中佔有一定地位。所以，嘉慶朝時對這些「遺珠」的拾取，或許是重新發掘了作品的價值之光，也或許，他們所看重的，正是作品上先人手澤，及對他父親乾隆皇帝的回憶。

依循上述的理路，還可以推敲另一種印記組合產生的原因。前舉任仁發〈飲中八仙圖〉（圖八）上，雖鈐乾隆型「宜子孫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與「乾隆鑑賞」印記，但卻有嘉慶型「石渠寶笈」。無獨有偶，院藏邊武〈千字文〉（圖十一，典藏號：故書一六九）上，卻是鈐以嘉慶型「宜子孫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與「嘉慶鑑賞」，並有乾隆型「石渠寶



圖十二、武元直《赤壁圖》及其上的「石渠寶笈」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印記組合形式才會存在，顯示該作經鈐「上等三璽」後，要到嘉慶朝才寶藏於「天府石渠」，並益以嘉慶型「石渠寶笈」印記；而鈐於邊武〈千字文〉之上的印記組合，顯示其未及鈐上「上等三璽」就遭汰除，後成爲清仁宗拾取的前朝遺珠。（註一）如此一來，纂輯《三編》時的忙碌情況，似乎可以略加想像，當時的相關工作人員，不只是評等、加鈐制式的「典型《三編》」印記，還必須重新審閱前朝所不選的作品。若再度入選，便補鈐適當的印記，令其合於當下的定則，重令遺珠入於櫝中。這些作爲，同樣不見載於文獻，只隱藏在《三編》印記組合大同中的「小異」。



圖十一 邊武〈千字文〉及其上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笈」與「乾隆御覽之寶」。兩件作品的鈐印組合雖然相斥，卻顯露著互補的樣態。個人以爲，這種狀況產生的原因，同樣與《續編》的纂輯有關。雖然在前引《續編》凡例中，已說明擇取書畫的第一步驟是直接鈐以五

璽，但是，由於《續編》的作爲中，部分參考、遵循《初編》的作法，故取《初編》凡例加以參照：

「石渠寶笈」、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二璽，冊、卷、軸皆同，上等者，則益以「乾隆鑑賞」、「

「三希堂精鑑璽」、「宜子孫」三璽。

也就是說，《續編》在鈐蓋「五璽」的第一步驟中，可能與《初編》類似，細分爲兩個不嚴格區分前後的步驟，所以任仁發〈飲中八仙圖〉上

### 小結

最後，讓我們把眼光移到院藏名作武元直〈赤壁圖〉上（圖十二，典藏號：故畫九九三），由畫作上所鈐押的「石渠定鑑」、「寶笈重編」二印（圖一），可知是《續編》著錄的作品。然而，經由以上的討論，眼尖的讀者很快會發現，武元直〈赤壁圖〉上的「石渠寶笈」印記，似乎是嘉慶型，而非乾隆型。如果這一方印記不是在嘉慶朝補鈐的，恐怕嘉慶型「石渠寶笈」印記早在乾隆朝晚年，就已經存在了。事實上，武元直〈赤壁圖〉並非孤例，院藏尚有數作也存在著同樣的狀況，如姚文瀚〈摹宋人文會圖〉、艾啓蒙〈百鹿圖〉、賈全〈八駿圖〉等，都是收入《續編》，卻鈐有嘉慶型「石渠寶笈」印記。但因這些畫作之上也見有清仁宗的鈐跡，因此無法排除爲嘉慶朝因點檢、裁切重裝之故，而補鈐其上的可能。幸運的是，院藏的張宗蒼〈雪景圖〉（圖十三，典藏號：故畫一七〇九），狀況與上列畫作相似，卻

# 錦繡自玲瓏



## 院藏貿易瓷特展

An Assorted Tapestry of Lustrous Beauty:  
Export Porcelains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

錦繡自玲瓏—院藏貿易瓷特展

展期：2010/06/20~2011/08/01

陳列室：203

本展分為「多樣的中國貿易瓷」與「陶瓷工藝的交流」兩個單元，分別陳述院藏中國歷代貿易瓷在樣式設計上的變化，以及中國陶瓷對亞洲鄰近各國貿易瓷燒造上所呈現的影響。



無任何嘉慶朝的鈐跡，應可支持嘉慶型「石渠寶笈」印記實刻於乾隆朝晚期的推論。換句話說，嘉慶型「石渠寶笈」印記，在《續編》纂輯之際，就已開始使用，分擔著乾隆型「石渠寶笈」印記任務，並非因應《三編》才刻就的新印。雖然其具體使用的範



圖十三 張宗蒼《雪圖》及其上的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# 註釋

1. 當然，這些作品也可能是《初編》的子遺，但就個人所見，凡是載於《初編》的作品，其上「石渠寶笈」印記，若與收入《續編》者相對，《初編》的「石渠寶笈」印記的邊框多半相對粗而明顯，而無論是與黃庭堅《寒山子龐居士詩》或邊武《千字文》類同的印記組合中，其「石渠寶笈」印記樣式與《續編》較接近，故在此推測其與《續編》關係較深。

### 參考書目

1. 《石渠寶笈 秘殿珠林三編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2. 郭果六，〈窗外讀印雜記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總二七五期（二〇〇六年二月），頁七二-八三。
3. 李郁周，〈乾嘉二帝的兩套書畫收藏印-石渠寶笈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宜子孫〉，《書法教育會訊》，一一八期（二〇〇七.二），頁一四-一五。

圍不明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方印記在乾隆朝並未獲得廣泛的使用，以致於相對少見，要到嘉慶朝才加以沿用，配合上真正新刻於嘉慶朝的嘉慶型「三希堂精鑑璽」、「宜子孫」，賦予其《三編》典型印記的身份，成為內府整理、編次書畫藏品的要角之一。

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